

中國文學在俄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上)

李 福 清 (B. Riftin)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

12-16

俄國雖然是中國的鄰邦，兩國早在17世紀便有了交往，但俄國人對中國文學發生興趣，卻要比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和法國）晚一些時候。

俄國在1932年出版了較為完整的《中國書目》（P.E. Skachkov編的）¹，收錄1730年到1930年兩百年來出版有關中國的書籍及報刊文章目錄，共一萬多條條目。1948年美國Ann Arbor影印了該目錄。1957年莫斯科又出了Skachkov與I. Glagoleva女士合編的《中國文藝作品俄譯文及俄文評論著作目錄》一書。1960年Skachkov的《中國書目》再版發行，收錄從1730年至1957年關於中國的圖書及文章目錄約兩萬條條目。

1986年莫斯科外國文學圖書館出版了Glagoleva女士編的《中國古典文學目錄：俄文翻譯及評論》（責任編輯為Sorokin教授），該書彙集從18世紀到1983年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俄文翻譯及研究著作之目錄，遺憾的是，儘管俄國早有這樣一些可資查詢考證的著作目錄，過去卻沒有人注意到早期（18世紀及19世紀）俄國讀者如何透過譯文接觸中國文學作品的具體情形。當然，這當中也有一些客觀困難，例如那時到底出版了一些甚麼樣的作品。

十八世紀

約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俄國讀者與中國文學的最早接觸，也是從小說開始的。在Skachkov編的《中國書目》中有幾篇題為《中國中篇小說》的作品。根據該目錄提供的材料，可知最早在俄國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是1763年於“Ezhemesjachnye sochinenija i isvestija of uchenykh delakh”（學術情況通訊月刊）十二月號發表的題為《中國中篇小說》的俄譯文，是譯自英文“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or letter from a Chinese Philosopher”（世界公民或中國哲學家來的信）。該書是英國有名的作家（詩人，小說

家，散文作家）Oliver Goldsmith寫的，副題名為：「住在倫敦的中國哲學家Lien Chi Altangi寄給Fum Hoam——中國北京典禮院第一主席（Fist President of the Ceremonial Academy）」

在此之前，1757年，英國小說家Walpole Horace發表了“A letter from Xo-Ho a Chinese Philosopher at London to his friend Lien Chi at Peking”（中國哲學家Xo-Hi從倫敦寄給他的北京友人Lien Chi的一封信）作品，透過中國人的眼睛描寫英國社會。

Goldsmith無疑模仿此作，連人名（Lien Chi）也不更改地寫下了富諷刺幽默的作品。兩位英國作家顯然都受到了當時法國啓蒙家的影響。但Goldsmith與其他當時的法國和英國思想家不同，他一面將中國社會制度理想化，另一面對當時中國的社會情況還是持了一些批評態度。但是他批評嘲笑的主要矛頭是英國的一些社會習俗。Goldsmith的信1760-1761年在英國“The Pubic Ledger”雜誌連載。1762年出版單行本。1763年在法國出版法文版，並多次再版。俄國雜誌反應很快，幾乎與法國同時注意到了這本書。但是俄譯文對該書諷刺英國習俗，及推崇中國制度好像沒什麼興趣，譯的不是Goldsmith假中國哲學家之名，談論對社會問題的看法，而是其所改寫的中國話本小說。儘管當時（18世紀中葉）俄國思想家在法國啓蒙家影響之下，剛開始翻譯法國Voltaire關於中國的雜文，此外俄國文人也開始嘗試寫一些將中國制度理想化的文章。²

1763年，“Nevinnoe Uprazhnenie”（純樸的習題）三月號發表了無名氏的關於古代中國法律的論文。Goldsmith在第十八封信裏專門談到不同國家的丈夫對待自己妻子的不同態度——英國人充分激情地愛自己的妻子；荷蘭人理智地愛妻子；其認為心中戀愛表示自己於千般非預謀的激情，但是每次在愛情中流露出的那種突發式的激情

1. P. E. Skachkov. “Bibliografija Kitaja”, Moskva-Leningrad, 1932.

2. 參見O. Fishman. “Kitaiski satiricheski roman”（中國諷刺小說），Moscow，1966年，第166-168頁。

表示，是自然而然，而非刻意而為的一種感情。但是每當這種激情開始冷卻，恰好證明的是戀愛雙方出現了互不信任、理解或者不誠實。

下面我們來看俄國雜誌根據Goldsmith作品譯的〈中國小說〉內容如下：高麗國有夫婦倆，男的是姓黃（俄譯文將Choang誤譯為Hoang），女的名為Gansi（Goldsmith寫的是Hansi）。兩口子相敬互愛，日子過得非常好。有一天黃某偶遇一漂亮婦人，用扇子朝一座墳墓使勁搗風，黃不解其故，過去探問。婦人答道：她新近守寡，丈夫臨死時吩咐，要等他墳墓上的土乾了，妻子才能改嫁。該婦人說她已經搗了兩天，但墳土還未乾。黃某於是領女人到自己家中，並把此事告訴Gansi，不料妻子妒火中燒，儘管當時天氣很不好，還是把婦人趕出了家門。此時黃某的一個學生來到黃家，黃突然昏倒，一命嗚呼。Gansi當時很悲哀，但過了幾個小時後卻與那個學生講定，三天後他們結婚。等到把黃某的屍體入於棺材中，那個學生突然也不行了。聽說要用剛死亡的人的心臟才能治好他。Gansi於是拿斧頭敲打丈夫的棺蓋，棺蓋打開時，黃某卻復活了，黃某不明白妻子為什麼穿戴得那麼漂亮。Gansi含羞自盡，黃某於是把她的屍體放進那口空棺中，丈夫則娶了那個搗墳的漂亮婦人。這個故事裡的一些細節，諸如Gansi鼻子上帶寶石、夫婦親嘴等等似乎不像是中國人寫的。

實際上Goldsmith的作品是改寫自《今古奇觀》第二十卷〈莊子休鼓盆成大道〉話本小說。他自己在這封信最後一句說「Choang是哲學家」，所以他知道Choang不是普通的一個人（但俄譯文沒有這一句）。很可能Goldsmith根據的是法國1736年出版Du Halde的“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第三卷中的這個話本小說的法文譯文，或1741年倫敦出版的該書英文版。不知為什麼Goldsmith把故事搬到高麗，把莊子之妻田氏改名為Hansi。雖然他基本保留了話本的大致情節，但除了上述小細節之外，他還改了故事的結尾。原文寫田氏自殺之後，莊子燒掉房子並安置妻子屍體入棺，然後「遨遊四方，終身不娶，或云遇老子於函谷關，相隨而去。已得大道成仙矣」。英國作者改寫為主人翁與那個用扇子搗乾丈夫墳墓的漂亮婦人成婚，實際上完全篡改話本的道教思想。Goldsmith講的故事與道教無關，所以新的故事也與話本不同，黃某學生在話本裡不是真有其人，而是「莊生分身隱形之法」，是莊子為了考驗妻子而施的計謀。話本入話說：「如今說莊子鼓盆的故事不是唆

人夫妻不睦，只要辨出賢愚，參破真假」。這與Goldsmith這封信前一部分寫的關於不誠實情感一句相似。Goldsmith改寫的故事主要根據西方人的思想描寫Gansi是不忠不孝的妻子，而丈夫也一樣，妻子死後馬上另結新歡，兩個是一丘之貉。故事與中國話本不同而有些西方的幽默味道。

過了20多年，1785年時，聖彼得堡出版一本小書，題為“*Tshuang-tse i Tiena, ili otkrytaja nevernost*”（莊子與田氏或者顯明的不忠實），裡面共收有四篇小說。而這些小說是從法文譯過來的，內容仍是上面提到的《今古奇觀》裡的話本小說〈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其大約是譯自Du Halde的“*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t. III, P.401-416）。據M. Davidson女士的目錄記載：1762年英國的Thomas Percy曾將這篇小說簡要地譯成了英文，他是從法文翻譯的。³據法文的俄譯文作者刪去了小說的入話，直接從故事內容開始，並連原話本裡的詩也一起譯出。更有意思的是，彼得堡出版這本小說集，編者有意將中國話本小說同另外三篇西方小說（大約是西班牙小說）合在一起，雖然他沒有寫什麼序言或注解，我們仍可以這樣推測——編者將中國話本小說與西方類似話本的中篇小說，看成是同類的作品。

特別應該提出的是，三篇西方小說中有一篇題為“*Mesopotamia Efranor*”的故事（大約也是西班牙的小說），其故事內容頗似中國話本小說。它講的是有一個叫做Efranor的年輕人，在路途中搭救了一位老人和老人的女兒，後來年輕人愛上了這位小姐並娶了她，婚後多年兩人恩恩愛愛，就像話本裡寫的莊子與田氏一樣。不料他們居住的城市突然來了一位漂亮的希臘小姐，Efranor又愛上了這位希臘小姐，為了與她同居，他欺騙妻子，並將妻子和女兒殘忍地遺棄在離家很遠的地方。這位負心漢以後吃了許多虧，但他最後還是找到了終身愛他的妻子和已經長大的女兒。西方小說與中國話本所描寫的社會習俗頗有不同，但大意都是相通的。若說中國小說講的是女人的不忠實，則西方小說講的是男人的不忠實。在18、19世紀的西方人眼裡，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是兩碼事，中國文學同中國的風俗習慣一樣，是奇異古怪的東西，完全是看不懂的exotic（異國風味的）。俄國出版的這本小書的無名編者，能將中國小說與西方小說相提合刻出版，在當時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三年之後，1788年，上下兩卷本的俄譯文學作品選集，題為《譯自各種外文書的阿拉伯、土耳其、中國、英

3. M. Davidson, *A list of published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Part 1, Ann Arbor, 1952年, p.39

國、法國的牧人，神話小說選》，在俄國出版。該書中有一篇話本小說，名為〈善有善報〉，一看便知是真正的话本小說，它是從英譯本《今古奇觀》第三十一卷〈呂大郎還金完骨肉〉轉譯的，這篇話本小說據M. Davidson女士編的《英、法、德譯文中國文學目錄》介紹，1741年倫敦出版的法國Du Hald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⁴一書中有這篇小說的英譯文，但俄譯文有附注說：該小說英文譯者是一位女士，由此可見，本譯文依據的是另一個為M. Davidson所未提到的這篇《今古奇觀》的故事早期英文譯本。⁵1962年，有了新的從中文翻譯的版本。1962年莫斯科出版了由兩位漢學家I. Ciperovich與V. Velgus合譯的《今古奇觀》二十篇話本小說。⁶該書在頗長的後記中談到了西方從18世紀後半葉翻譯《今古奇觀》的情況，但隻字未提俄國也有人雖不是從原文、但是十八世紀也翻譯過《今古奇觀》的話本。

根據Skachkov的《中國書目》記載：彼得堡所出版的*Sobranie novosti*（新消息匯編）雜誌於1775年12月號刊載了名為〈中國中篇小說〉的一篇作品，它像是從法文或英文轉譯的「偽造小說」。該作品也沒有什麼小說情節，講的是某一個北京人（無姓無名）與某個歐洲人的對話。北京人抱怨現在的生活不如以前，因為現在大家都不作壞事，所以法官無利可圖，富人與窮漢可以入同一個門，所以做官的也無利可圖。歐洲人答道：在西方也一樣，沒有戰爭，軍官抱怨，沒有病人，大夫抱怨……。

〈兄弟你不必抱怨，我們那兒（指西方）比你們更糟〉。顯然，這篇作品一點也不像中國小說。大約因為在18世紀很多西方文人將儒教及中國制度過於理想化了（19世紀上半葉俄國漢學創立者Bichurin也曾將中國清王朝理想化），於是某個西方人寫了這篇具有諷刺意義的作品。

1792年，莫斯科雜誌“*Chtenie dlja vkusa, rausa, razuma i chuvstvovaniia*”（味、智、情而讀物）第一分冊發表了題為〈恩人與賢人，中國中篇小說〉的一篇作品，我認為這也是偽造之作。作品說的是有一位號為Tshing-fang（？）的中國皇帝，要找真正的賢人，大家都說有位名叫Hamzu-U的賢人，寫過一百本有關孔子經典的注

解。皇帝於是將此人找來，叫他一番講演後，皇帝認為是「空談」，便吩咐將他趕出去。後來又找來一位名叫Tse-e的奇人（按：因為中國人都吃冷飯，他卻要吃熱菜，別人都喝溫的，他卻喝涼的。所以稱之為奇人，但這些都不像是中國習慣），皇帝對他講的那一套，也不滿意。第三位是傳揚「無為」學說的一位官人，皇帝同樣不欣賞他。京城中四萬學者，居然找不到一位真正的賢人，於是皇帝更衣化名，只帶幾名近寵去四處私下訪尋。他們遇見一位名叫Timu-U的人，原來卻是個恨世者，在深山老林過著隱居生活；後來他們又在某一個大城市裏遇見了一位名叫Outsi-fong的有智識的人，皇帝敬重他的博學，但卻不能容忍他的吝嗇。最後，皇帝遇見了一位名叫Rong-zun的種田人，此人過著淡泊寧靜、合於道德的生活，原來他是先帝的大臣，後來無辜被謗，憤而隱居。皇帝回京城後，把Rong-zun及其兒子傳入宮來。

這完全是西方人偽造的作品，人名，特別是皇帝帝號都不像，但故事及人物卻有點像中國的，中國有不少描寫皇帝更衣化名，微服私訪的傳說和小說，並且古代中國也有不少解釋孔子學說的人，有不少無辜遭謗的忠臣義士，憤世嫉俗，過著隱逸超脫，田園牧歌式生活的人更是多不勝數。從人名來看，這篇作品大約是從法文轉譯的偽造的小說。

該雜誌同年（1792年）第五分冊也發表了另一篇小說，題為〈友人〉，註明是從G. Arnold的著作選譯的，譯者為V. S（大約是姓名的第一個字母），但原書名為何？是否是英文版？不詳，待考。這篇作品有一點像中國的話本小說，但我仍有些懷疑。內容如下：古代堯帝之時有兩個朋友，一個姓Kiang（蔣？），另一個姓Fang（方？）。方殺了一個名叫Ming的人，並將此事告訴了蔣。後來蔣得知官兵抓了一位姓Uting的無辜者（此人有美德），便跑到斷頭台為無辜者喊冤，並說是自己殺了那個Uting。姓方的知道後，馬上也跑到那裡，聲明真正的凶手是自己。

這樁案子呈到皇帝那裡，皇帝下令將姓蔣的升官，將姓方的赦免，並說：「罪犯已看見了行刑的冷杖，這樣的

4. M. Davidson Op. cit., p.42

5. 眾所周知，Du Halde的書原是用法文寫的，俄國國立圖書館藏的Du Halde 1736年文版卷三有《今古奇觀》此話本的翻譯（pp.362-375），不知為何M. Davidson女士目錄未提。1774年彼得堡出版的Du Halde書第一卷及1777年出版的第二卷的俄文版裡無此話本小說。（由於俄文版是簡譯，俄文版裡無此及其他法文版的話本小說及戲劇。因為中國人未見俄文版常常發生誤會，如潘子星等人談到1774年俄國譯了元曲《趙氏孤兒》（光明日報，1962年，5月20日），其依據便是Du Halde的俄譯本。事實上，在俄文版裡並無《趙氏孤兒》的譯文）。

6. “*Udivitelnye istorii nashego vremeni i drevnosti*”, Moscow, 1962年, V.I-2

懲罰也就夠了。」這樣歌頌友誼的故事情節中國好像有，但我認為此作品偽造的可能性較大，推想是偽造者把這類故事搬到堯帝之時。

綜上所述，十八世紀俄國讀者所看到的所謂「中國中篇小說」，除了《今古奇觀》裡的話本小說之外，其餘都是西方人士所偽造的作品。

十九世紀

從19世紀初開始，有時我們在俄國雜誌上看到的中國小說大部分可以說是真的。如1810年*Drug junoshestva*（兒童之友）雜誌（第11期）發表了幾個中國故事，題為〈中國的anecdote〉（當代俄文裡anecdote是「笑話」的意思，當時則與英文一樣，為「逸事」之義）實際上，這裡發表的是幾則有關中國風俗的消息（沒有什麼情節），其中有一篇講述一個煉丹術士（其實是騙子）的故事，可以認為是《今古奇觀》第39卷〈誇妙術丹客提金〉的俄譯文，譯者刪去了「入話」，有些細節作了改寫（如譯文裡騙子說他要去給父親送葬，原文是母親），但整個故事翻譯得不錯，沒有失掉中國小說的味道。

大約19世紀初俄國讀者對中國逸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興趣。1821年“*Zurnal departamenta narodnogo prosvetshenija*”（國民教育部雜誌）上發表了從滿文轉譯的〈中國的anecdote〉。據雜誌上註明，這是從皇家圖書館所藏的滿文抄本譯的，可惜未說明抄本之書名，也未署譯者之名。

1839年，當時的漢學家也是滿文學家A. Vladykin在著名的雜誌“*Syn otechestva*”（祖國之子）上，發表了他從漢文及滿文譯的〈中國逸事〉（譯文也名為「中國anecdote」）十一則。很可能，1821年發表的那篇從滿文譯的中國逸事，譯者也是Vladkyin。1821年發表的逸事沒有什麼情節，但也有幾個是具有小說式的情節和故事性，如其中一則說的是江州縣令（應是鍾離義）擬把女兒嫁給某一位官人的兒子，忽然發現女兒的丫嬛在一旁抽泣不止，在詢問她後方知，此丫嬛原來是個官家小姐，父親死後遂被賣身為奴。鍾離於是將此事告訴了女兒未來的公公，後來小姐連同丫嬛一同嫁給了官人的兩個兒子原作無疑是話本〈兩鄉令義婚孤女〉（《醒世恒言》第三卷）。此外，還有一則小故事：明代江西有一個人叫做Feigung（費公？），在湖廣教書，兩年後領得酬金回家，途中遇見一位痛哭流涕的女人，打聽後得知，女人的丈夫是人家的奴隸，她想賣身，給別人當奴婢，然後用所得的賣身錢贖回丈夫。Feigung遂把自己的錢全部送給了這個女人。待回家一看，全家人都窮得只有野菜吃，後來天公報答

他。從滿文轉譯的逸事，中文書上大約也有，可惜我尚未找到。

1839年發表逸事中還有二十四孝的故事，如王祥臥冰、唐氏乳姑、及來自《列女傳》孟母三遷等。這些逸事都有情節及故事性，但還談不上具有小說性質。

除了題為〈中國中篇小說〉及〈中國逸事〉的譯文之外，19世紀上半葉的俄國雜誌還發表了所謂〈中國民間故事〉兩篇，但實際上並不是民間故事，而是從法國著名漢學家Abel Remusat編的“*Contes Chinois*”（巴黎，1827年出版）一書轉譯的中國話本小說。一篇題名為〈三個兄弟〉發表在“*Moskovskij telegraf*”（莫斯科電報）雜誌上（1827年第20期）由此可以看出，法國出版的書馬上引起了俄國雜誌的注意。雜誌上註明說，翻譯的目的是「為了讓俄國讀者知道今天的巴黎人喜歡什麼，不過只是一種對事物的好奇心而已。」意思是說這個故事本身並無多大文學價值。實際上這並不是中國民間故事，而是《今古奇觀》第三十一卷〈呂大郎還金完骨肉〉的話本小說。上面已說過，該小說已在1788年被譯成俄文，這已經是第二次翻譯。無名的譯者肯定不知道18世紀那次翻譯。

第二篇故事發表在1828年的另一個雜誌——“*Russkij zritel*”（俄羅斯觀者）上面，題為〈真相大白的誹謗〉，其實也是從Abel Remusat的書轉譯的《今古奇觀》第二十九卷〈懷私怨狠僕告主〉。無名譯者寫有小引，其內容則與《莫斯科電報》上小註不同。《俄羅斯觀者》之譯者說：「Remusat在巴黎出版該書引起了新的摩登樣式，那裡因此有了中國式的帽子、手鐲、鞋等物；對於我們，俄羅斯人，Remusat的書則從另一方面讓我們感到有興味，中國的故事很像我們的俗文學故事，一樣的具有在講故事人身上所體現出的那種包含著狡滑、刻薄的老實性。如果將Remusat書中的故事全部譯成俄文，那將為這一點提供不可爭辯的證明。」無名譯者說得對，中國話本小說的確有點像17-18世紀俄國俗文學裡的中篇小說。無名譯者的小引大約是俄國人第一次從文學角度來評價中國文學作品。雖然這個故事是從法文轉譯的，但譯得比過去好，保存了一些中國話本的特點，儘管它也同其他譯文一樣刪去了「入話」。

Skachkov的《中國書目》記載：彼得堡“*Majak*”（燈塔）雜誌1841年（第17-18期）發表了P. Korsakov的〈中國中篇小說〉，實際上這並不是Korsakov的作品或譯自中國小說，而是從英文雜誌“*Foreign Quarterly Review*”轉譯的一篇長書評。這篇書評介紹的是1839年廣州出版的英譯文《今古奇觀》第三十五卷〈王鸞嬌百年長恨〉，該書評介紹得非常仔細，幾乎講述了整個故事情節，甚至連該本裡

的詩也引了，透過這篇書評，俄國讀者實際上又了解了《今古奇觀》的另一個故事。

1847年，彼得堡“*Otechestvennye Zapiski*”（祖國紀事）雜誌又發表了《今古奇觀》裡的另一篇話本小說〈羊角哀拾命全交〉（第十二卷），譯文題為〈死後友人〉，大約譯自1845年巴黎“*Journal asiatique*”（亞洲雜誌）（t.4 No.3）S. Birch發表的英譯本，二種譯文的題目也相似，英文是“Friends till death”。

據我所知，最早譯成俄文的中國章回小說是上面提到的俄國滿文及漢學家A. Vladykin譯文《金雲翹傳》，是從滿文譯的。該小說的滿文譯文抄本是孤本，藏在東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Vladykin的譯文241頁也藏在那裡，可惜未出版。

第一次在俄國發表的中國章回小說，是1827年在“*Moskovskij vestnik*”（莫斯科通報）雜誌上（第十期）的〈玉嬌梨〉的片段，是從法文譯的。法文版〈玉嬌梨〉是Abel Remusat譯的，1826年在巴黎出版，過一年就在俄國介紹了。第一次直接從中文翻譯的章回小說是1832年在俄國彼得堡出版的文集“*Severnnye tsvety*”中的〈好逑傳〉的一些段落。“*Severnnye tsvety*”（北方花朵）原是俄國著名的詩人A. Pushkin（普希金）的好友Delvig編的，1831年Delvig去世之後，普希金為了紀念亡友，決定繼續出版該文集，而編了1832年的這一本。眾所周知〈好逑傳〉當時在歐洲早已因1761年出版的英譯本而聲名遐邇。1766年出版從英文本轉譯的德文本和法文本。於是，某一位俄國漢學家也醉心於這部小說（也可能和歐洲譯本無關），此人的姓名我不知，但知他把這部章回小說全部譯出來了。

從1832年俄國作家和評論家O. Somov給一位歷史學家寫的信裏得知，Somov有從中文翻譯過來的這部小說俄譯全文，並說他正在等候I. Bichurin（俄國漢學研究之創始者）回國審閱譯文，還說著名的東方學家Shilling那兒有該小說的滿文和漢文本子。⁷可知譯者非Bichurin。《北方花朵》發表的是〈好逑傳〉中的第12回（也不全）。譯文之前有短序說：「這篇小說非常有趣，內容很新奇，富有新奇的中國風俗，並且它是由中國人所描寫的。」無名氏譯本雖然譯的不錯，但原文中的對白常常被簡略了，有

些地方動作描寫的連貫性也被破壞了。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至今尚未弄清楚，這個漢學家譯的〈好逑傳〉根據的是哪一個版本。據日本大塚秀高教授編的《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第80—82頁）收錄該小說共有23個木刻版。大部分無年代可考，其中四個是1832年之後的，與俄譯文無關。可惜我手上只有癸亥年花月獨處軒藏版的本子（俄國科學院漢學圖書館藏）；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的是根據廣西師範學院藏的舊版整理出版的本子；以及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再版的同治五年（1866年）翠芳樓版等三個版本。獨處軒版本題是癸亥年印的，柳存仁教授認為是康熙年間的癸亥，也就是1683年。大塚秀高教授寫的是同治年間的癸亥年，即1863。韓錫鐸、王清原合編的《小說書坊錄》（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76頁）只說獨處軒印的這本〈好逑傳〉同治二年或康熙年刻。漢學圖書館藏的本子不大像同治年間的版本，俄譯文與這三個版本不合相同，如我所見的三個版本都說鐵中玉要找皇帝派往東昌府的大臣，而俄譯文裡卻是來到Suidefu的大臣，可能是綏德府，但東昌府是在山東，而這個綏德府在陝西，譯者也不可能把山東的東昌府這個地名念成Suidefu。另一個例子，過公子的友人張公子見到鐵公子後說：「……真無異於女子！莫非Liu-heu復活了嗎？」而在我所見到的版本均無什麼Liu-heu（應為hou），獨處軒本寫：「真無異于女子，想是晉候後身了」；廣東人民出版社的本子：「……想是晉候坐了事」。查了好多辭典，也查了諸橋轍次編的《大漢和辭典》及臺灣出的《中文大辭典》都無什麼叫晉候的。據譯者注云：「Liu-heu是漢高祖之大臣」看來是張良。他貌美封為留侯。可能是我所見的版本把「留」字刻錯「晉」字，那俄文譯者譯的版本應是對的。

無名氏譯的〈好逑傳〉全文未出版，大約因為同年莫斯科有一個出版社出了另一個無名氏根據法文譯的〈好逑傳〉全文。⁸該譯文是根據M. A. Eidous 1766年在Lyon出版的，或1828年巴黎再版的本子。Eidous轉譯的是J. Wilkinson 1761年在倫敦出的英文譯本，也譯了法文譯者的序言，俄文譯者還寫到他希望俄國讀者像法國讀者一樣將會稱讚這部小說。

（下期續完）

7. 參見“*Russki arhiv*”（俄羅斯檔案）雜誌1906年，第10卷第260頁。

8. “*Gao-kin-chuen, ili blagopoluchnyi brak*”（好逑傳或美滿的良緣），Moscow, 1832—1833, v. I—II。